

红色传承：兵团题材小说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

郑亮，张博

(集美大学 海洋文化与法律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相辅相成，不可分割，集中贯穿于新疆兵团题材小说六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并赋予兵团题材小说丰富的红色内蕴。该文从新疆兵团题材小说的创作实践入手，按照时间顺序，对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进行了系统梳理与集中阐释。在此基础上，指出新时代兵团题材小说应继续坚持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完成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

关键词：兵团题材小说；红色传承；革命叙事；浪漫抒写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规划基金项目“新疆兵团红色文化资源传承与传播研究”（19YJA850016）

“红色文化”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建设过程中经过不断选择、重组、整合中外优秀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中国特色文化”^{[1]44}。作为物态红色文化组成部分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称“兵团”）红色文艺作品，特别是红色文艺的典型代表——兵团题材小说，自诞生起便植根于兵团现实，生动反映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兵团人屯垦戍边、维护民族团结、发展生产的历史。纵观兵团题材小说六十多年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革命叙事和浪漫抒写一直贯穿其中，二者是兵团题材小说传承红色精神的关键所在。进入新时代，面对复杂的社会背景和多元的文化环境，兵团题材小说应继承好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以红色精神凝聚人心，完成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

一、兵团题材小说的红色历程

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相辅相成、密不可分：革命叙事规定了创作的主题范围，而浪漫抒写则作为主要的表现方式为红色题材作品服务。二者的关系有着深厚的理论遵循：早在1927年，蒋光慈便将浪漫主义同革命相联系：“惟真正的罗曼谛克才能捉得住革命的心灵，才能在革命中寻出美妙的诗意，才能在革命中看出有希望的将来”^{[2]71}；20世纪30年代，受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影响，我国接受了革命浪漫主义的创作方法；1933年周扬在引入并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提出以浪漫主义照耀现实的观点，这就将颓废的浪漫主义改造为抒发革命理想与英雄气概的浪漫主义，对文学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1938年毛泽东同志为鲁艺的题词不仅把“浪漫主义”同“革命”紧紧联系，还将其提升至同现实主义一样的高度；1958年毛泽东同志“倡导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革命浪漫主义”开始作为“两结合”的组成部分，与“革命现实主义”一同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三次代表大会上被正式确立为全体文艺工作者的共同奋斗方向。此后，以浪漫主义书写革命题材作品便成为红色文艺创作的重要原则。

还需注意的是，革命叙事及浪漫抒写的运用与文学的叙事品格及国内现实环境密不可分：一方面，叙事的客观性要求小说有一种真实感，而这种真实感来自于“小说世界与真实世界的同构”^{[3]110}，因此，利用文学反映社会真实便成为小说创作的必然要求。彼时，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的胜利已成为群众的集体记忆，因此，再现革命光辉历程、确证革命合法性与合理性便成为文学创作者主要的目标。同时，为了使文艺更好为社会主义革命及社会主义建设服务，须借助革命叙事塑造主流意识形态、激发民众的革命热情，鼓舞民众投入社会主

义建设。因此，革命叙事的流行便成为历史必然。可以说，革命“不仅组织着叙事的进程，制约着叙事的走向，同时也规定着叙事的意义”^{[4]215}；另一方面，叙事的能指性要求作品不必拘泥于历史本身，而是大胆砍削枝蔓，揭示其隐喻及象征的意义，使作品获得“在生活的原生态中所缺少的强度”^{[3]110}。因此，要借助革命叙事展现革命情怀“抒情的、诗意的、浪漫的核心”^{[5]133}及革命历史的“本质真实”，建构民众信仰，就必然离不开浪漫精神的指引。浪漫主义可以最大程度解放作者思想，激发创作者大胆运用想象、夸张等手法讲述革命神话，传达革命理想主义、革命英雄主义、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更好服从革命叙事的要求。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不仅影响了红色作品的创作，同时也赋予了兵团题材小说多元的创作风貌和丰富的价值蕴含。

“十七年时期”是兵团题材小说创作的发轫期。创作出《苇湖老人》（1958）、《三不吹》（1958）、《边疆海燕》（1958）、《种籽》（1959）、《阳光灿烂照天山》（1959）、《多浪河边》（1961）、《军队的女儿》（1963）等作品。这一时期的文艺创作秉承《讲话》精神，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以抒情性的话语讴歌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新疆、屯垦建设的功绩，描绘了宏阔的历史画面；通过描写光明与黑暗的斗争故事，确证革命的正义性、红色政权的合理性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性，体现出鲜明的革命叙事特色。在人物塑造上呈现出典型示范的特征：创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深入观察和深刻体验，选取革命战斗英雄和兵团建设中的先进人物为表现对象，展现了他们不畏牺牲，有勇有谋、铸剑为犁，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操。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形象，不仅仅能凭借其高尚的道德感染人、激励人，更重要的一点在于，创作者希望以这些“特殊的个别去透视社会现实的本质，为人们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提供了与普通政治、经济、社会等文献观察相比更有感染力的审美范例”^{[6]14-21}。他们既是一种人，又是很多人，为了能塑造好“体现同一概念的一整个范畴的人们”^{[7]120}，作者对人物身上的闪光点进行挖掘、提炼、概括、升华，并融入想象和夸张，通过浪漫抒写突出了人物的英雄气概，体现了革命叙事与浪漫抒情交融的特色。

1966年至1976年间，作品在数量上大大缩减，仅以《边防狩猎》（1975）和《古玛河春晓》（1977）为代表。特殊的时代环境使政治性成为文艺创作的最高标准。这一时期，革命叙事和浪漫抒写具体体现在主题表达和人物塑造上。一方面，作品将阶级斗争作为核心主题，通过敌我双方的较量，展现了敌人必然失败，我军必然胜利的主题，在对战斗过程的描写中，把宏大叙事推向极致。另一方面，“三突出”“三结合”“三陪衬”“三铺垫”“多侧面”等创作原则加剧了人物扁平化、符号化、程式化的特征，理想化、神圣性消解了英雄人物的复杂性：凡是正面人物，均身材魁梧，武艺高超，神机妙算，有勇有谋，情操高尚，是无所不能的超人；反面人物作为正面人物的映衬，显得外表顽劣，笨拙又愚钝。创作者通过想象和夸张塑造人物，一方面增强了主题的政治性，另一方面艺术性的欠缺和创作的僵化与教条成为不容忽视的问题。

进入新时期，兵团题材小说获得了新的发展空间，收获了丰硕的成果。产生了《美国专家“为什么”》（1980）、《将军的故事》（1982）、《山谷·小屋·女人》（1984）、《家族之谜》（1990）、《桑那高地的太阳》（1996）、《母亲》（1998）、《野麻滩》（1997）、《金色的阿尔泰》（1998）等代表作。此时的小说，革命乐观主义的基调被冷静理性的思考取代，宏大叙事被日常生活叙事取代。革命历史事件不再作为重点被详细描绘，而是化为人物成长的背景。创作者尝试以历史重组自身，以个体经历展现历史景观，以人文关怀为主，立足生活真实，还原兵团生活的原貌。首先，小说的题材得到了拓展深化：既有表现伤痛的“伤痕文学”，又有描绘改革开放新生活的“改革文学”，既有对支边青年坎坷命运的书写，

又有对团场建设中人与自然关系的沉思，作品呈现出多元化主题。其次，此时的兵团人，不再是时代的符号与阶级的代名词，真正从“大写的人”中解放出来，成为一个个鲜活饱满的个体，既有为国奉献的一腔热血，也有面对抉择时的迷茫、无助、焦虑、痛苦。最后，在叙事技巧上，告别了以往单线叙事方式，运用多条线索，将兵团人的成长、亲情、爱情、传奇经历交织在一起，不仅使情节显得跌宕起伏，浪漫主义手法的运用也凸显了作品的艺术特质。

21 世纪，受消费主义和大众文化的影响，一方面，文坛形成了红色题材小说与其他题材作品多样化发展局面；另一方面，兵团题材小说的展现方式也渐渐多样化。作家们尝试“以新理念、新思维、新方法突破以往的窠臼，为兵团题材小说的创作注入新内容，开辟新路径。经过创作者们的不懈努力，产生了《复活的玛纳斯》（2002）、《古尔图荒原》（2001）、《白豆》（2003）、《静静的下野地》（2004）、《老风口》（2010）、《伊犁河谷》（2018）、《疆山》（2019）、《界碑》（2019）、《蛟龙出天山》（2020）等代表作。这些作品在主题呈现、人物塑造、技巧运用上各具特色，并在对革命叙事和浪漫抒情的把握中，实现了红色基因的传承”^[9]。一方面，新世纪的兵团题材小说继承了上一阶段对宏大叙事的消解，不再对政权的合法化进行确证，也不再探讨具体历史事件的是非功过，而是更多在深入把握革命叙事的基础上，“以更加广阔的维度展示历史变迁，探讨革命本质，讲述复杂人性，书写蕴含丰富红色基因的时代新内容，以扶贫、抗疫、新农村等社会现实，体现新时代兵团人的集体无意识”^[9]，揭示他们“心灵和意志的较高远的旨趣”^{[10]375}，具有当下性审美意味；另一方面，不少成长于新世纪的作家，并未经历过往的岁月，只能在掌握有限资料的基础上，“化严密论证为浪漫想象，以虚构的方式补充细节，凭借浓郁抒情和手法创新完成对红色精神的表达”^[9]。

二、兵团题材小说的革命叙事

兵团题材小说常借助革命叙事“宣传无产阶级的革命理想，革命策略和革命的方针政策…将其理想、策略、方针政策说成是社会发展之必然，说成是现实客观的东西，而实际上这种理想不过是一种政治乌托邦想象。”^{[11]178}可以说，兵团题材小说自诞生以来，便同革命叙事建立了天然联系，是“关于革命成长、革命品质、革命牺牲的政治寓言”^{[4]30}。

（一）早期的革命叙事

在兵团题材小说中，传统的革命叙事集中体现为“成长型”英雄的塑造、革命斗争主题呈现和革命斗争场面的描绘三方面。

1. “成长型”英雄的塑造

兵团题材小说创作初期，创作者坚持文艺的“工农兵方向”，以饱含激情的笔触，塑造了一批以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等为代表的“成长型”英雄形象。作品以主人公的成长为线索，详细展现了他们在接受新思想熏陶前后的变化，以及在党的教育下，最终成为革命新人的全过程，既符合革命现实，又富于革命理想。比如：《边疆海燕》的主人公小豆豆，受同事的影响，思想上发生动摇。在得到党组织的关怀教导后，振奋精神，最终成为了优秀的拖拉机手；《工程师讲故事》中的李工程师受兵团恶劣环境的影响，产生了消极懈怠的情绪。最终，他在徐管理员大公无私精神的感召下，思想得以蜕变，精神得以升华，获得了新生；作品中最有代表性的“成长型”英雄人物，莫过于《多浪河边》的主人公哈得尔，他堪称是兵团题材小说中的“卡里斯马典型”。所谓“卡里斯马典型”，即“是艺术符号系统创造的、位于人物结构中心的、与神圣历史动力源相接触的、富于原创性和感召力的人物”^{[12]12}，具有“象征性”“中心性”“神圣性”“原创性”“感召力或感染性”^{[12]14}。天生对地主怀

有仇恨的农民哈得尔，几次反抗都以失败告终。在遇到了革命者阿不力孜后，受对方的启蒙，明白了革命的意义，彻底摆脱了农民阶级的局限性，成为一名无产阶级战士，完成了从自发反抗到自觉革命的转变。在这里，哈得尔的觉醒与斗争在革命叙事框架内得到了既定讲述，个人的成长历程与民族、国家的发展趋势相吻合，进一步彰显了党的先进性。

2. 阶级斗争的主题表达

兵团题材小说的革命叙事还体现在鲜明的阶级对立性上。作品通过正义与邪恶的斗争，揭示出落后阶级必然为先进阶级消灭的革命规律，凸显了阶级斗争主题。《楞老去》以线性时间作为人物成长的关键线索，勾勒出主人公从农民到革命战士、生产英雄的蜕变历程，揭示出唯有坚持党的领导，才能带领农民赢得阶级斗争胜利的主题；《古玛河春晓》通过讲述依沙拜克老人的故事，不仅生动展现了农民与地主的阶级矛盾，还深刻探讨了从个人复仇到阶级斗争主题置换的深层原因：农民与大地主、大牧主之间的矛盾，不仅仅是私人矛盾，而且是阶级矛盾，单靠一个人的力量，并不能从根源上消除剥削与压迫。农民要推翻的，不是一个地主，而是迫害劳苦大众的旧社会。明白了这个道理后，依沙拜克才真正跳出个人复仇的小圈子，将家族仇恨转化为阶级仇恨，个人意识转化为阶级意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作者在表现阶级斗争主题时，将革命这一富有现代性意味的命题镶嵌在传统伦理叙事的框架中，通过展现地主阶级与农民阶层的对立，说明革命历程虽然漫长，但革命理想终将实现的真理。伦理性的渗透，为党领导地位的合法性与合理性提供了有力确证。同时，革命英雄主义与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的传达，也使浪漫主义的气息弥漫了整个作品的缝隙。

3. 革命战争场面的描绘

兵团题材小说常借助宏大叙事体现革命的鲜明特色。宏大叙事“遵循某种理论预设，以历史的某些重大事件为标志划分时期或阶段，从该时期或阶段中寻出一些重大事件或一连串性质相同相近的事件，根据这些事件的性质特征断识它们反映了这段历史的某种发展趋势”^{[13]110-114}。兵团题材小说要通过展现重大历史事件凸显党领导革命的正义性，就必然离不开战争场面的描绘。《阳光灿烂照天山》通过讲述解放军挺进新疆的历史，集中展现了解放军在塔里木沙漠及戈壁平叛土匪乌斯满作乱的战斗场面，气势磅礴、宏大庄严，丰富的战斗细节增加了文本的历史真实性，胜利的结局也将蓬勃昂扬的革命激情渲染到极致；《古玛河春晓》再现了人民解放军进驻新疆，维稳戍边的历史。其中，“苦战一碗泉”“连环夹子阵”“荒原初战”“北戈壁的枪声”等章节详细描写了我军同土匪的战斗：诱敌战、包围战、歼灭战等战术的运用，展现了我军智慧超群、英勇顽强、不畏艰苦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传达出军民一心，民族团结的红色主题；《多浪河边》以青年哈得尔的个人成长历程为主线，通过一系列斗争场面的描绘，还原了解放军剿匪、反霸的历史，探讨了革命的起源及本质，揭示出少数民族人民要想获得真正的解放，必须坚持党的领导这一真理。

（二）革命叙事的承续与突破

进入改革开放时期，革命叙事传统在延续中有了一系列创新与突破：延续之处在于作品对兵团红色精神的继承，而突破则体现在人物塑造的平民化倾向及革命乐观主义的消解两方面。

1. 兵团红色精神的继承

随着文化语境的变化，兵团题材小说在创作中不再沿用以往的革命思维。然而，革命本身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不会因革命的退潮而消逝。有不少作品通过追忆老一代军垦人的贡献，表现对兵团红色精神的认同。《界碑》再现了人民解放军同国民党之间的盘营岭之战，通过对排地雷、持枪闯伏击圈等战斗细节的描述，歌颂了解放军战士热爱祖国、不畏牺牲的革命

精神与高尚的英雄品格：《母亲和我们》讲述了第一代戈壁母亲刘月季的故事：她起早贪黑为战士洗衣做饭、将没有血缘关系的女孩视如己出、为了解救战士们的饥荒，含泪杀掉心爱的毛驴…作品通过一个个生活细节，颂扬了戈壁母亲无私奉献的精神；《疆山》以全景式、立体化视角展现兵团人捍卫主权、戍边守土的爱国之情…纵观兵团题材小说的创作可以发现，以兵团精神、老兵精神、胡杨精神为代表的红色品格，非但没有因时间的侵蚀而褪色，反而与日俱深、历久弥坚，深深植根于大众的集体无意识中。兵团题材小说对红色精神的继承，不仅体现了兵团人在“道德上的不朽，审美上的崇高”^{[14]205}，同时也满足了受众对英雄的崇拜，符合了他们的期待视野。正如作家吴静林在采访中说：“我们的时代需要英雄，英雄的感化和引领作用不可或缺…无论时代怎么发展，人的思想观念如何变化，国人的血性都是不能少的。”^[15]

2. 人物塑造的平民化倾向

进入新时期，兵团先后举办两次文艺创作的座谈会，指明了要以兵团人物形象的塑造作为文艺工作的任务。在此背景下，传统的革命英雄失去了生存的土壤，开始褪去神圣的光环，由伟大走向平凡。兵团题材小说中人物塑造的概念化、模式化倾向不复存在。作品开始立足生活真实，展现兵团普通民众的迷茫与坚韧，焦虑与痛苦。《这“老兵团”啊！》以回忆的方式，还原了兵团生活的本相，通过“老兵团”和翠翠的爱情，表明兵团人并非都是超尘脱俗的英雄。他们会受到环境的挤压，经历生活的坎坷磨难，也有七情六欲和喜怒哀乐，是活生生的普通人；《如果让我再选择》真实反映了援疆知青的心路历程。知青们从大城市来到兵团，恶劣的生活条件和繁重的劳动任务使他们颇为不适。然而，当他们真正回到家乡后，又被铺天盖地的迷茫席卷。在这里，人物塑造以“真实”为立足点，意在说明，英雄也有爱恨，也有缺点，也有生而为人的欲望和痛苦。创作者将视角集中在这些以往兵团题材小说未曾涉及的层面，以“个人化、民间化的叙事取代了阶级性、正史性的传统革命历史叙事…展现人的本能欲望和本体诉求…在很大程度上还原了人性和历史的真实性与复杂性，契合了大众的审美期待”^{[16]46-50}。

3. 革命乐观主义的消解

与平民化人物塑造倾向伴随而来的，是革命乐观主义的消解。革命乐观主义基调的设定是为了适应建国初期文学为政治服务的需求。通过简单的二元对立以及正义战胜邪恶的美好结局，彰显无产阶级革命必然胜利的规律。进入新时期，随着现实主义思潮的回归，人们开始重新审视过往的岁月。《桑那高地的太阳》以支边青年的爱情悲剧为主线，以粗犷悲壮的笔触，展现了知识分子谢平从一腔热血到信念毁灭的过程，融入了作者对兵团生活的严峻反思；胡尔朴的《卵石雨》并未从正面歌颂兵团知青们艰苦创业的奉献精神，而是立足生活真实，展现了返乡知青们复杂的心路历程：繁荣大都市固然让人留恋，但条件艰苦的塔里木却更能锻造人的意志与品格，因而更值得铭记。多年的兵团生活使慕容秋实真正将自己的血脉与这片大地连在一起，这份牵绊也使他最终回到了农场。作品通过知青对人生道路的选择，探讨了人生价值的实现问题，充满哲理性的思辨与感悟。

三、兵团题材小说的浪漫抒写

兵团题材小说中虽有革命叙事一以贯之，然“革命斗争的开展需要借重群体性的情感认同，文学的抒情以柔软的面向呈现革命理念以获取情感共鸣。革命开拓社会、文化空间的构想与实践同样需要抒情笔触的点染”^{[17]176-182}。当革命历史通过叙事呈现于文学作品中时，创作者还应使兵团题材小说承担起歌颂光明、抒发理想、引导道德的作用，用浪漫情怀“让人

们看到美好、看到希望、看到梦想就在前方”^[18]。兵团题材小说中的浪漫抒写具体体现在人物塑造、情节设定、环境描写、审美风格等方面。

（一）早期的浪漫抒写

在兵团题材小说的初创期，浪漫元素便在作品中初现端倪。为更好服务于革命叙事，浪漫抒写常体现在作品塑造人物、设定情节等方面。想象、夸张的运用，一方面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另一方面，作品通过对革命年代艰苦历程的歌颂，彰显革命理想主义光辉，呈现出浪漫主义的美学特征。

1. 人物塑造的浪漫性

人物形象是小说创作的核心，承载了创作者的审美理想。兵团成立之初，红色小说常选取革命战斗英雄和生产建设中的模范人物为主人公。为表现他们屯垦戍边、发展生产的不朽功绩，创作者常常“杂取种种人，合成一个”^{[19]444}，运用想象、夸张等修辞，将人物身上的闪光点无限放大，通过英雄形象的塑造展现文艺生活“比普通的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因此就更带普遍性”^{[20]861}的特征。首先，正面的男性形象都拥有高大完美的形体，比如：《白金的家乡》中连长“结实粗壮，筋骨里好像蕴藏着无穷无尽的精力”^{[21]12}；《冰山雪岭》中边防战士孙宝君“浓眉大眼，体格魁梧”^{[22]265}。伟岸健硕的阳刚之躯往往能够爆发出异于常人的原始生命强力，勃勃生机是崇高的身体美学的反映。与此同时，作者赋予了与人物完美身形相匹配的超人能力，以夸大的笔法展现主人公智慧非凡、有勇有谋、无私奉献的集体主义精神和不畏牺牲的英雄主义情怀。其次，早期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大多个性刚强，精明能干，朝气蓬勃。这一方面是对“弱柳扶风”的传统女性形象的颠覆，体现了时代新面貌，然而另一方面，女性特质的抹杀，也逐渐模糊了男女性别界限。最后，反面人物形象大都面目可憎，被赋予妖魔化的特征：他们不仅有着歪嘴、麻脸、绿眼珠的猥琐面貌，同时，性格上也阴险狡诈、贪婪残暴。实际上，这样的人物设定体现了作者的巧思：即将敌我矛盾同道德冲突结合，借助人物塑造，突出作品邪不胜正，黑暗必将被光明驱除的主题。

2. 情节、悬念设定的传奇性

兵团题材小说常常以主人公的传奇经历为依据设计情节，并通过悬念设定和适当的虚构抒发浪漫情怀。在兵团题材小说初创期，作品中的传奇性情节不胜枚举，比如：解放军战士出神入化的枪法（《神枪手与“万里云”》）；战斗英雄将打红的机枪从碉堡中拽出来（《楞老去》）；一个连队缴获土匪 1000 多匹马、400 多支枪，创造以少胜的奇迹（《古玛河春晓》）；战士冒着雪崩危险修复线路（《冰山雪岭》）等等。其中，最富传奇性的作品要数《军队的女儿》。作品根据先进人物王孟筠的真实经历改编，主人公海英为了拯救国家财产，在艰苦的自然条件和繁重劳动的双重磨难下，得了关节炎、耳聋和瘫痪等疾病。然而海英不惧病魔，最终凭借顽强意志力重新投入工作。在这里，主人公顽强的意志力是崇高使命感赋予的，有了革命奉献精神的支撑，生命强力可以战胜一切困难。一方面，浓厚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正是作品浪漫性的生动体现；另一方面，悬念设定也充分凸显了作品的浪漫特质，增强了作品的可读性与感染力。《韩祥沟》并未从正面展示故事情节，而是设定了大量悬念，借助一虚一实两条线索推动情节发展，激发读者想象，使解放军战士与群狼搏斗的虚构场面展现出无穷魅力，颇有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之感。小说的末尾，衣衫褴褛、脚步踉跄、伤痕累累的韩祥出现，不仅使先前的种种推测得到了印证，同时，读者的期待视野得到了满足，作品有了完美的收束，悬念设定为作品笼上一层浪漫主义色彩。

（二）浪漫抒写的延续与发展

为更好传承红色基因，解决兵团题材小说中存在的“‘现实’有余，想象不足”、“叙述滞后、形态粗陋”^{[23]91}等问题，创作者在继承并延续浪漫主义的创作传统的基础上，不断探索，使之有了新的发展。浪漫抒写的延续和发展主要体现在自然景观书写、浪漫诗化的幻想两个方面。

1. 自然景观书写

自然景观的书写贯穿在兵团题材小说创作的全过程，且在不同阶段呈现各异风貌。小说初期，景物描写并未占据重要地位，在文本中所占的部分不长，主要集中在行军及战斗场面的描绘上，起到了为故事的发展提供背景、烘托人物、表现主题的作用。比如，《阳光灿烂照天山》中对景阳岭环境的描写：“风绞着大雪，山间寒气逼人”^{[24]7}。战士们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军，他们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意志就自然而然通过风雪衬托出来，达到了诗情同革命的有机结合；《冰山雪岭》中阿勒夏大坂“海拔近五千尺，冰雪四季不化，而且空气稀薄”^{[25]125}。然而，战士们利用地形地势，把气候恶劣的自然空间转化成大展身手的战场，展现出杰出智慧和非凡勇气，奠定了作品革命乐观主义基调。进入新时期，兵团题材小说中多以抒情性语言展现兵团的异域风光，借助多样化的手法，将景致的变化同人物情感的流动相结合，情景交融中赋予自然环境以诗性特征，实现了景观书写的新发展。比如：《伊犁河谷》中对早春景色的描绘：“春天积聚了一冬的力量，以一种从容不迫、不可阻挡的力量散发出来。…天山红花蕊对着蕊，手牵着手，嘴亲着嘴，憋红了脸，卯足了劲，如同青春的血液，如情谊的炽热。”^{[26]104}作品中支边青年们的生命就像盛开的天山红花，开得茂盛而炽烈。诗意的语言与原生态空间融合，同援疆知青们年轻的激情交相辉映，使作品呈现出纯净的牧歌情调。

2. 浪漫诗性幻想

兵团作家致力于打造风格多样的文艺精品。一直以来，兵团题材小说大都以写实为主，缺乏浪漫的想象。在这样的情况下，红柯的小说横空出世，凭借诗性幻想一枝独秀，呈现出鲜明的浪漫主义特征，为新时代小说的创作提供了有益借鉴。《金色的阿尔泰》将兵团设置为故事发生的背景，引入英雄史诗和民间传说，将营长和成吉思汗两人同大地母亲连接起来，“把屯垦写成一种类似开天辟地、鸿蒙初开的创世神话”^{[27]224}。在小说中，人与人、人与物之间的生命是相融相通的：蒙古老妈妈可以用树皮为营长疗伤，最终使他重新成为婴儿，并与大树连在一起；《复活的玛纳斯》继承了《金色的阿尔泰》的创作风格，团长到塔尔巴哈台重建家园的故事，与雄狮玛纳斯平息骚乱、打造“真境花园”的故事异曲同工，展现出创世英雄们强悍的生命力。在红柯的笔下，人与人、人与自然万物可以跨越时空，通过大地母亲，奇异地联系在一起。万物都展现出蓬勃酣畅的生命元气。红柯的小说，“以一种奔放雄健而又欢乐的诗性幻想”^{[27]224}为兵团题材小说注入了浪漫主义精神。

四、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的红色传承

纵观兵团题材小说的创作历程，可以发现，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统一于六十多年的创作实践中，并共同承担着弘扬红色精神的重要任务。进入新时代，兵团题材小说要实现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的红色传承，创作者一方面应坚持现实主义同浪漫主义结合的创作手法，另一方面突出作品的地域与民族性特征，在形式与内容上共同发力，从而“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28]。

（一）现实与浪漫的手法交织

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历来并行不悖。二者的分别“不在于是否反映现实，而在于反映方

式的不同：现实主义比较直接地、客观地反映现实，而浪漫主义则较多地透过主观的情感和理想去反映现实”^{[29]58}。因此，反映现实的共同目标便为两者的结合提供可能。早在1939年，毛泽东同志便为成立一周年的鲁艺题词“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30]24}；周恩来总理在阐释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时，也指出：“我们的理想主义，应该是现实主义的理想主义；我们的现实主义，是理想主义的现实主义”^{[31]132}。进入新时代，新疆兵团题材小说既要以严肃、冷静、客观的态度描述历史，反映现实，又应以充沛的情感与热切的关怀抒发理想，讴歌光明，从而完成发扬兵团精神、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

兵团题材小说在六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涌现了一大批现实精神同浪漫情怀结合的典范之作，比如：《驼运线即将消失》（1984）、《在新疆长大》（2016）、《界碑》（2019）等。这些作品既运用现实主义手法还原兵团革命、建设的历史事实，以细节描写凸显人物性格，揭露社会本质；又能凭借想象、夸张等浪漫主义手法，表现人物理想化的内心世界，以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坚定信念引人向上、催人奋进。《驼运线即将消失》以为边防站输送给养的驮运工苏哈尔的经历为主线，通过他在梦境中与骆驼的对话，以虚实结合的方式展现苏哈尔无私奉献的品质；《在新疆长大》中，作者用现实主义手法，对人民解放军解放新疆、部队整编、剿灭匪徒等历史事件进行还原。同时，还借助儿童视角，为原本残酷的现实注入了几分童趣。在这里，作者“不炫耀苦难，反而从青藤的苦汁中品味出香甜；他不以烦忧示人，而是奏响了荒原的欢乐颂”^{[32]61}，从诗学维度传达出兵团人的乐观精神和家园情感。

（二）地域与民族的风格呈现

“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33]81}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与历史文化背景，赋予新疆兵团红色文化鲜明的地域性特征。作为红色文化资源的代表形式之一，作家们将兵团屯垦戍边的历史记忆与庄严情感倾注笔端，把独特的审美追求与生命感悟纳入兵团题材小说的创作中，使作品在传承革命叙事与浪漫抒情的优良传统的同时，呈现出浓郁的地域风格与民族特色。

1. 边地风景建构

“风景是以文化为媒介的自然景色”^{[34]5}。新疆“三山夹两盆”的地貌造就了兵团恶劣的自然条件，为边地风景的建构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素材。《尘土飞扬》中，作者对于屯子的环境进行了描绘：“透过苇滩，看见了一片长着些稀稀拉拉的毛蒿草和骆驼刺的平地……平地几十年前就被太阳晒得失了鲜润，褪了色，干燥燥地发白”^{[35]114}；《老风口》勾画了知青眼里的兵团：“落日的尽头是一望无际的荒漠，荒原上无河流，无村庄，有的是被洪水冲击过的沟壑……所有沙包上都生满了红柳”^{[36]11}。荒漠、骆驼刺、红柳等典型意象一方面作为地域风情的标志物，构成了边地恢宏绮丽、渺远壮阔的画面，契合了读者对边地的前理解，散发出浓郁的浪漫主义气质；另一方面，这些意象是典型的军垦文化符号，凝聚了兵团儿女的智慧与韧性、奉献与坚守，承担起激活屯垦记忆、述说戍边功绩的重要作用：一群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在党的号召下，在兵团扎根，剿灭匪徒，维护祖国统一，更是在解放新疆后，同各少数民族一起，承担起发展生产的重任。他们铸剑为犁，筑路修渠，面对恶劣的环境，不畏艰险，报之以歌，将热血浇灌在荒漠，开出不屈的花朵，把无边戈壁滩涂化为连片绿洲和万亩良田。一系列地域书写将作者对兵团的热爱同雄壮奇谲的边地风景相结合，于情景交融中，歌颂了兵团人无私奉献、不畏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情怀。

2. 民俗风情描绘

新疆兵团作为民族文化荟萃之地，具有浓郁的人文风情。从服饰饮食、语言宗教到节日礼仪，多样化的民风民俗作为特殊的文化事象，如风情画般被广泛呈现在小说创作中，赋予

了小说鲜明的地域特色与民族风格。同时,人文风情作为兵团历史与现实的文化背景,与革命叙事和浪漫抒情紧密结合,成为兵团红色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天山筑路记》中记录了哈萨克青年的外貌与服饰:“他们的身体都很魁梧,身上穿着皮大衣和皮裤子,腰里栓根三寸宽的皮带,头上戴着皮帽,脚上穿着皮窝子”^[37]。寥寥数笔,衬出少数民族特有的彪悍之姿。除此之外,作品对哈萨克族的方言土语及日常饮食也有涉及:当连队将公路修好后,战士们常被称赞为“甲格斯”(意为“好”),且常被牧民们邀请到家里喝马奶、吃羊排;《穆罕默德·阿麦德》中,阿麦德用“大半斤”作为招待客人的餐食;《虚掩的土屋小院》中介绍了维吾尔族特有的送别仪式乃孜尔;《伊犁河谷》中,各少数民族人民用自己的语言为难产的孕妇祈福……一系列少数民族民俗风情书写,不仅展现出少数民族人民豪迈质朴、淳朴厚道的精神品质,同时也作为兵团题材小说的有机组成部分,与兵团革命与建设历程融为一体。这意在说明:是兵团为各族人民带来了新生活,作品传达出民族团结的主题。

五、结语

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集中贯穿在新疆兵团题材小说六十多年的创作历程中。随着时代的变迁,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几经发展,在解构与重塑中得以延续,成为兵团红色文化传播的关键。进入新时代,兵团红色文化面临市场经济发展下可能导致的不利因素和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在这样的情况下,新疆兵团亟需“以红色故事凝聚人心,用红色精神汇聚时代强音。革命脚步虽已远,然红色命脉不能断。传承好红色基因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赋予兵团题材小说的使命。传承红色基因并非一日之功,不能一蹴而就。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一代又一代兵团人戮力同心,共担使命”^[9]。这要求创作者把兵团题材小说的创作经验汲取好,把革命叙事与浪漫抒写继承好。只有这样,才能使兵团题材小说在缅怀历史、反映现实的同时,讴歌光明,抒发理想,实现红色基因的赓续与传承。

参考文献

- [1] 覃辉银. 革命历史文化与思想政治教育[M]. 广州: 华南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8.
- [2] 蒋光慈. 蒋光慈文集 第4集[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8.
- [3] 徐岱. 小说叙事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4] 姜辉. “红色经典”的模式化叙事研究 革命想象与叙事传统[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 [5] 王德威. 抒情传统与中国现代性在北大的八堂课[M].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0.
- [6] 王一川. 典型示范及其他——红色文艺经典的修辞美学思考[J]. 中国文艺评论, 2021,(04).
- [7] [苏]别林斯基著, 梁真译: 别林斯基论文学[M]. 上海: 新文艺出版社, 1958.
- [8] 朱德发.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英雄”理念的逻辑演绎[J]. 山东师范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4,(04).
- [9] 郑亮、张博. 兵团题材小说红色基因探究[N]. 中国文化报, 2021-7-20(3).
- [10] [德]黑格尔. 美学 第2卷[M]. 朱光潜,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1979.
- [11] 余虹. 革命·审美·解构 20世纪中国文学理论的现代性与后现代性[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1.
- [12] 王一川. 中国现代卡里斯马典型 二十世纪小说人物的修辞论阐释[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1994.
- [13] 刘俐娜. 疏离宏大叙事之后——中国近代史学史研究现状及思考[J]. 湖北社会科学, 2015(1).
- [14] 李泽厚. 美学论集[M].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80.
- [15] 舒晋瑜. 吴静林. 新时代需要赞美英雄的文学作品[J]. 中华读书报, 2019-04-16.
- [16] 李洪华. 大众文化语境中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审美取向与问题反思[J]. 中国文艺评论, 2021(4).
- [17] 刘贵. “抒情”如何表达革命——鲁艺学员的创作及其困境[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20,(11).

- [18] 习近平. 在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N].人民日报. 2015-10-15(2).
- [19] 鲁迅. 鲁迅文集 杂文集(下)[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4.
- [20] 毛泽东.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M]//毛泽东选集: 第3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1.
- [21] 权宽浮. 牧场雪莲花[M]. 上海文艺出版社, 1959.
- [22] 中国作家协会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分会编. 短篇小说[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1979.
- [23] 刘岸. 困境中的求索——兼谈“兵团小说”的不足[J]. 小说评论, 2000(1).
- [24] 碧野. 阳光灿烂照天山[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
- [25] 李志君. 冰山雪岭[M]. 乌鲁木齐: 新疆青年出版社, 1982.
- [26] 刘凡. 伊犁河谷[M].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8.
- [27] 夏冠州, 艾光辉. 新疆当代多民族文学史·小说卷[M]. 乌鲁木齐: 新疆人民出版社, 2006.
- [28] 习近平. 贯彻全军政治工作会议精神扎实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N].人民日报, 2014-12-16(1).
- [29] 朱光潜. 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J]. 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1963.
- [30] 毛泽东. 毛泽东文艺论集[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2.
- [31] 赵春生. 周恩来文化文选[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 [32] 刘涛. 兵团屯垦神话及其诗学阐释——评鞠利长篇小说《在新疆长大》[J]. 新疆艺术(汉文), 2019.
- [33] 鲁迅. 鲁迅全集: 第13卷 [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
- [34] [美]W. J. T. 米切尔. 风景与权力[M], 杨丽, 万信琮,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 [35] 刘岸. 尘土飞扬[M]. 乌鲁木齐: 新疆美术摄影出版社, 2009.
- [36] 张者. 老风口[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6.
- [37] 李盛方. 天山筑路记[M]. 北京: 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9.

Revolutionary Inheritanc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and Romantic Expression of XPCC Novels in the New Era

ZHENG Liang, ZHANG Bo

(College of Marine Culture and Law,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Abstract: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and romantic writing complement each other and are inseparable. They run through the work writing process of theme novels of XPCC(Xinjiang Production and Construction Corps) for more than 60 years, and give them rich revolutionary connotation. Starting with the writing practice of such novels,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investigates and focus on th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and romantic expression in chronological order. On this basis, it is pointed out that such novels in the new era should continue to adhere to revolutionary narration and romantic expression, and complete the mission of inheriting the revolutionary gene.

Keywords: theme novels of XPCC; revolutionary inheritance; revolutionary narrative; romantic expression

作者简介:郑亮: 男, 安徽阜南人, 集美大学文学院教授, 硕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文学研究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 张博: 女, 河南郑州人, 仰恩大学助教, 文学硕士。